

# 如何制定減少 跨代貧窮的社會政策

鄧廣良 林靜雯 編

香港亞太研究所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WAN, NEW TERRITORIES

588

HONG KONG

D676.500  
2002

港台

公共政策論壇報告

# 如何制定減少跨代貧窮的社會政策

鄧廣良  
林靜雯  
編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 編者簡介

鄧廣良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講座教授兼系主任。

林靜雯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 鄧廣良、林靜雯 2005

ISBN-10: 962-441-161-1

ISBN-13: 978-962-441-161-4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目 錄

|                           |    |
|---------------------------|----|
| 前言 .....                  | 1  |
| 討論內容                      |    |
| 市民對政府扶貧政策態度意見調查 .....     | 2  |
| 兒童貧窮的原因和處理 .....          | 6  |
| 香港的貧窮現況 .....             | 9  |
| 如何制定減少跨代貧窮的社會政策 .....     | 12 |
| 以資產為本的政策減少跨代貧窮 .....      | 16 |
| 貧窮家庭及其需要 .....            | 23 |
| 討論 .....                  | 27 |
| 附錄一：參加者名單 .....           | 35 |
| 附錄二：市民對政府扶貧政策態度意見調查 ..... | 36 |

# 如何制定減少跨代貧窮的社會政策

## 前言

(楊汝萬)

香港亞太研究所舉辦公共政策論壇已經有好幾年。從1998年開始，我們選擇年內一些重要的政策，讓學者、政府官員和香港市民共同討論。今天的議題是扶貧。扶貧是2005年施政報告內的一個重要議題。政府察覺到在經濟全球化影響之下，出現「工種外移」和失業率高企的情況。而社會上部分的低收入人士經過了這幾年，經濟情況同樣轉壞，他們需要社會的關懷和幫助。

政策的重點是如何減少跨代貧窮。與此同時，政府成立了扶貧委員會，有很多委員也出席了今天的論壇。現在，委員會已開始運作。在施政報告內，除了提出設立扶貧委員會外，也提出設立攜手扶弱基金、兒童發展先導計劃等。稍後，鄧廣良教授會根據2005年2月的電話調查結果，簡報市民對這些措施的看法和探討市民的有關態度。

從一個廣闊的角度來看待扶貧的問題，其實由來已久。在古時的封建社會，社會不平衡的現象被視作理所當然，也是一個常態。無論在東方或西方社會，奴隸制度、權力和財富向宗教或其他重心傾斜，同樣十分普遍。在1980年代至二十世紀末這段時間，是全球化最興旺的時期，但根據聯合國的統計數字，貧困人口在這段時期大幅增加，28億人口的經濟狀況比以往差了。另外，大多數貧困人口聚居於南亞和非洲。世界銀行是採用一日一美元或是一日兩美元來計算貧窮家庭入息中位數。根據這個數字，全球墜入貧困網的人數是數以億計。所以

從宏觀的角度看，貧窮問題相對於現今科技發達和財富積聚明顯的國家來說，確是一個很大的諷刺。

再就香港而言，關乎社會榮辱安定的扶貧政策，有學者和觀察者認為，政府致力推動紓解貧困的同時，一定不能矯枉過正，因為這樣會使香港快步邁向福利社會。有些在香港長期居住的市民認為，香港人的拼搏精神，是靠自力更生和吃苦鍛鍊出來，這種精神需要經過長時期的磨練。但今天的貧困社群，則傾向求助於政府而不反求諸己。「靠人不靠己」這個概念在這一代似乎十分盛行。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健康和有害香港長遠發展的趨勢。明顯地，新成立的扶貧委員會是必須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和理念，為政府貢獻良策。在幫助貧困社群的同時，不要增加社會矛盾。這是一個頗大的挑戰，而這工作對於香港未來發展是十分重要的。

最後，在此我祝扶貧委員會和有關的工作可以順利開展。它們的工作任重道遠，同時也深受社會各階層關注。希望它為香港帶來更安定和更繁榮的日子。我在此再次多謝今天出席的嘉賓，正是你們帶來美麗的陽光和風和日麗的天氣，因為我們好幾天都沒有見到太陽了，亦是你們帶來了這美好的環境給我們討論今天的重要課題。我預祝今天的研討會取得美滿成果。多謝各位。

## 市民對政府扶貧政策態度意見調查

（鄧廣良、林靜雯、張宙橋）

貧窮問題在過去數年成為香港市民關注的議題。行政長官在2005年的施政報告亦提出一系列扶貧政策，包括設立扶貧委員會和攜手扶弱基金、推行兒童發展先導計劃、增撥資源予學校及青年機構提供課餘及興趣活動，以及提供各種補助和津貼以提供進修上進的機會。

為瞭解市民對政府扶貧政策的態度和意見，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在2005年2月18日至2月22日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以電話隨機抽樣方式，成功訪問了1,005位年滿18歲的香港成年市民（抽樣方法見附錄二）。

在1,005位受訪者中，男女約各佔一半（46.4%為男性，53.6%為女性）。其中六成以上（65.4%）年齡介乎30至59歲，30歲以下者佔19.1%，而60歲或以上者則只有15.6%。教育程度在高中或以上者佔67.5%，初中者佔16.4%，而小學或以下者則佔16.1%。逾半為在職人士（53.1%），家庭中有人納稅的受訪者有679人。家庭人均每月收入在4,000元以下的貧窮受訪者有220人。

### 對貧窮問題的態度

受訪市民覺得本港的貧窮問題頗嚴重，有近半數（46.5%）受訪者覺得本港的貧窮問題嚴重或非常嚴重，覺得問題不嚴重或非常不嚴重者則只有一成（10.4%）。對於跨代貧窮，則覺得其嚴重性略低，只有約四成（38.2%）的受訪者覺得問題嚴重或非常嚴重，而覺得不嚴重和非常不嚴重者則有近二成（18.8%）（見附錄二表一）。大部分的受訪者（58.5%）認同政府有責任解決社會的貧窮問題，而覺得沒有責任的則只有7%（見附錄二表二），這顯示市民對政府承擔解決貧窮問題抱有期望。

### 對扶貧政策的意見

市民並不預期施政報告所提出的扶貧政策對紓解貧困有很大幫助。對於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內成立「扶貧委員會」及「攜手扶弱基金」的建議，受訪市民預期此兩者對紓解貧窮問題的作用只是一般（分別為33%及32.6%），對於扶貧委員會，有三成半（35%）的受訪者覺得作用不大（有7.7%覺得完全沒有幫助，而有27.3%覺得無甚幫助），覺得有作用的只有約兩成（21.6%）。雖然，市民覺得攜手扶弱基金較扶貧委員會的

作用略佳，有近三成（28.7%）覺得基金有助紓解貧窮，但亦有近三成（28.8%）覺得作用不大（見附錄二表三）。

整體來說，受訪者不覺得施政報告內所提出的扶貧政策對解決跨代貧窮問題有很大幫助（32.9%覺得沒有幫助，37%覺得一半半，而只有20.1%覺得有幫助）。相對於「扶貧委員會」和「攜手扶弱基金」，其他三項較具體的扶貧措施在受訪市民心目中有較正面的肯定，其中以提供補助和津貼，讓青少年有進修機會一項被認為幫助最大（有49.6%的受訪者覺得有幫助，只有19.5%覺得幫助不大）。而對於兒童發展先導計劃和增撥資源提供課餘及興趣活動，受訪者亦覺得有助紓解社會的貧困問題（分別有42.2%及44%的受訪者覺得上述兩項措施有效）（見附錄二表三）。

市民的有關意見差異頗大，當中最大的分歧是在於增撥資源予學校及青年機構提供多些課餘及興趣活動的預期效果（標準偏差27.4）。無論如何，市民在各項意見上的偏離程度平均都超過一個級別。因此，市民對扶貧有關的意見，並未達到共識。

### 個人和家庭背景對貧窮問題看法的影響

受訪者如何看待貧窮問題及跨代貧窮問題的嚴重性，受下列個人及家庭背景因素影響：

- 現正接受或曾接受綜援的受訪者，比從未接受者較多覺得跨代貧窮問題嚴重（52.7%相對於40%）。
- 非納稅人比納稅人較多覺得貧窮問題嚴重（50.5%相對於44%）。
- 家中沒有納稅成員的受訪者，比家中有納稅成員的受訪者，較多覺得貧窮問題嚴重（55.6%相對於45.2%）。
- 同樣的，家中沒有納稅成員的受訪者，比家中有納稅成員的受訪者，較多覺得跨代貧窮問題嚴重（54.3%相對於44.4%）。



- 家中有學前兒童的受訪者，比家中沒有學前兒童的受訪者，較多覺得跨代貧窮問題嚴重（51.5%相對於39.3%）。
- 就業狀況不同的受訪者，對扶貧的意見顯著不同，失業和待業人士比就業人士較多覺得貧窮問題嚴重（63.6%相對於46.4%）。
- 家庭收入愈高的受訪者愈覺得貧窮問題不嚴重。如以家庭人均收入不足4,000元作為貧窮家庭，則有關家庭的受訪者比其他受訪者，較多認為貧窮問題及跨代貧窮問題嚴重（分別為54.9%及48.2%相對於46.6%及38.6%）。

### 個人與家庭背景對扶貧政策意見的影響

受訪者如何看待施政報告內所提出的扶貧政策，亦受下列個人及家庭背景因素影響：

- 現接受及曾接受綜援的受訪者，比從未接受者較多預期扶貧政策有助紓解貧窮問題（32.2%相對於21.5%）。
- 非納稅人比納稅人，較多贊成施政報告內所提出的扶貧政策（52.2%相對於45.3%）。
- 家中沒有納稅成員的受訪者，比家中有納稅成員的受訪者，較多覺得政府有責任解決貧窮問題（67.6%相對於55.8%），贊成有關扶貧政策的比例亦較高（51.6%相對於38.6%）。
- 失業和待業人士比就業人士較多贊成施政報告內所提出的扶貧政策（42.4%相對於38.5%）。
- 教育程度對贊成施政報告內所提出的扶貧政策有顯著影響。小學或以下程度的受訪者較多贊成有關政策（55.2%），而教育程度較高者（高中或以上）則較少贊成（39%）。
- 家庭收入愈高，愈少贊成施政報告內所提出的扶貧政策。例如家庭收入一萬元以下的受訪者比收入一萬元或以上者較多贊成（57%相對於37.2%）。

- 同樣的，貧窮家庭的受訪者，比其他人士較多認為政府有責任解決貧窮問題（67.6%相對於55.9%），預期兒童發展先導計劃有助紓解貧窮問題的比例也較高（48.7%相對於41.8%），以及較多贊成施政報告內所提出的扶貧政策（55.8%相對於37.1%）。
- 貧窮家庭中有在學成員的受訪者，比其他人士較多認為政府對解決貧窮問題的責任較大（76.1%相對於58.2%）。
- 貧窮家庭中有在學成員的受訪者，比其他人士較多覺得增撥資源予學校及青年機構提供多些課餘及興趣活動有助紓解貧窮問題（47.4%相對於23.8%）。

## 總結

調查結果顯示，雖然受訪者對貧窮問題的看法有差異，卻普遍認同解決貧窮問題是政府需承擔的責任，其中以貧窮家庭對政府的期望更高。調查結果顯示市民在這方面的期望。

對施政報告內所提出的扶貧政策，受訪者的支持程度只屬一般，而且意見差異頗大。是否接受綜援、要否納稅、就業狀況、家庭收入及家庭狀況對受訪者對貧窮問題的嚴重性和政府解決貧窮問題的責任的看法有相當影響。這些影響反映了本身的需要和利益。

## 兒童貧窮的原因和處理

（馮檢基）

很開心能夠回到中大，我自己曾經在這裏讀了五年書。首先，我想貧窮問題如果只抽取兒童問題來研究是不足夠的，因為兒童貧窮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生活在貧窮家庭。如果要解決跨代貧窮問題，必須先整體瞭解貧窮是什麼一回事，也就是為什麼會有貧窮家庭？其次是瞭解貧窮家庭的兒童有什麼需要，而

這些需要又可以怎樣處理，所以我認為兒童貧窮問題是家庭貧窮問題的一個分枝。第三點是我希望提出對貧窮文化的一些想法，即是社會對這些貧困人士會否有歧視或是標籤的情況？這些標籤對於生長在貧窮家庭的兒童會否造成信心上的打擊？第四點是我希望瞭解究竟社會有沒有為這些人士提供機會，讓他們可以在社會階梯上爬升。不論往上或是往下，每個人都應該有同樣的機會，如果貧窮家庭能夠有機會向上爬，他們子女的情況也會有所改善，但是如果沒有機會，子女也就難於上進。最後一點，我認為政府的政策，包括兒童發展先導計劃、青少年中心和學校的課外活動、15至24歲的師徒計劃等，都未能針對我剛才所說的最基本貧窮問題，只是些治標的方法。其他的培訓計劃我覺得是好的，但我們必須有跟進的工作和就業機會。而剛才所說的五點都是我認為需要處理的基本大方向。

要處理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先處理文化問題。一直以來，政府都強調貧窮是個人問題，是因為個人懶惰所致。但其實現時香港約有70萬的在職貧窮人士，他們有工作，但只得很低的薪金，難道要他們長時間工作嗎？如果以12元時薪為例，他們每日工作12小時，一個月只得5,000元，這收入不足以讓他們支付一個四人家庭的開支。我認為是因為香港的經濟轉型，工種少了，工作也少了，而讓人往上爬的機會也少了。怎樣可以解決這問題呢？現在我們所著重的是高科技、高知識，這對社會上的中年人士是不易處理的，也是培訓不了的。所以我建議，政府是否可以向低看一看？而不是什麼也要求高知識呢？政府是否可以推行二元經濟呢？我並不反對經濟轉型，但我們同時要照顧跟不上經濟轉型的人士，政府是應該推行一些積極干預的政策。我的意思是劃出一些空地來發展工業，讓有關人士可以參與其中，如新界最近的回收工業。除了新界外，九龍又是否可以發展這些香港現時需要的新興工業呢？這樣便可以開拓多一些工種，讓更多人可以就業。

另外，正如我剛才說，只有12元時薪是否一個合理的價

錢呢？他們付出了一天絕大部分的時間，卻供養不了自己的家庭。在香港這樣一個富裕的社會，相對於一年平均是23,000美元的人均GDP，這是一個不合理的價錢，絕對是個社會問題。第二，對於解決兒童貧窮問題，有兩件事需要考慮。一是教育。剛才提出的計劃如青少年中心或者學校應該提供更多服務，這裏不予評價，待有關計劃推出細節才加以討論。但以深水埗為例，我們沒有為這個社區提供新的設施，有些中心曾推行電腦回收計劃，打算送給區內兒童，但是兒童卻拒絕接收，因為他們家裏根本沒有空間放下一台電腦。他們平日只可以在床上做功課，在床上玩耍，根本沒有多餘的空間放置電腦。但是學校要求的功課都需要用電腦，於是我們就想辦法。由於已經不能再興建社區中心，我們提議學校延長開放時間供學生使用校內電腦。但是學校卻有困難，令這建議討論了幾年都不能推行，例如電腦維修保養的問題、人手安排的問題、行政費用等問題，而政府也沒有給予支持或回應。由於居住環境差，兒童只有一張床的活動空間，他們根本沒有心留在家中做功課，甚至不想留在家中，所以他們會走到街上，於是有可能遇到不好的人。我們曾經提出一些建議，但是政府沒有理會，如我們提議舊區重建，為居民提供新的居住環境，給他們多一些居住空間，建設更多屋邨設施等。貧窮並不單單是錢的問題，居住設施也是一個問題。深水埗是最遲推行舊區重建的一區，如果能夠收回舊樓宇，改善居住環境，兒童就會有一個較好的成長環境。又如小班教學對小朋友的學習很有好處，為什麼遲遲不推行呢？政府連這些主要的貧窮問題都沒有提出針對性的解決辦法，又怎樣可以靠那些兒童發展先導計劃解決問題呢？我是不相信的。

最後我希望提出兩點，扶貧委員會到現在也不願意訂出一條貧窮線，那社會又怎能為貧窮下一個定義？5,000元、4,000元收入，還是3,000元？我不知道，他們會說，不如以對象劃分吧，難道長者、兒童、失業人士等都各自劃一條貧窮線嗎？而

開會後委員會說會請經濟專家做一份研究文件，而傳聞說兩個月後只能定出一個研究方法，再開會評論方法是否可行，然後又不知道要用多少時間定出指標、又再作評論。到何時才能定出一條貧窮線呢？這樣慢的進度，很容易令人覺得政府根本沒有決心、沒有意志處理貧窮問題。即使將來我的提議如開放學校等能被接納，我願意為他們寫一張清單，但是解決問題的方向並不是這樣的。現時的經濟政策在製造貧窮人士，這些重要的問題為什麼不加以理會呢？作為立法會議員，我便要用立法會的機制推動政策，我要比政府的工作更快一步。如我們會在四月對各國的扶貧政策進行比較研究，讓議員給予意見。五月會推出另一份文件，指出香港其實已有很多不同的貧窮界定，根本不需要再慢慢重新研究，希望這能給予政府壓力。扶貧委員會現在經常徵求不同人士的意見，難道政府沒有自己的意見？政府沒有自己的價值觀？既然願意成立扶貧委員會，我相信政府是有一定的價值觀，政府一定是同意社會有貧窮問題存在。所以我們會從三個方面與政府商議有關事項，一是立法會，二是區議會，而民協亦正進行有關工作。希望其他政黨亦能一起進行，因為需要政府、議會、民間三方面合作。但如果政府沒有合作意願，那怎樣推行？我們便唯有自己進行工作，再向政府施壓。今天我大概先和大家分享這些意見。

## 香港的貧窮現況

(周永新)

### 引言

我對香港貧窮情況的研究，也差不多有30年了。1970年代中，我正在編寫自己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東南亞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比較之下，發覺香港的情況不算好，也不太差，窮人可得當時公共援助的保障。菲律賓和馬來西亞也是發展中地

區，但按照官方數字，它們國民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生活在貧困之中，溫飽也成問題。

貧窮是普世現象，無論一個地方如何富庶，總有些人基於某些原因而貧窮。另一方面，就是人的溫飽不成問題，但相比之中，總有些人感覺自己生活不如人，在別人和自己眼中也算是貧窮了。

貧窮有客觀的條件也有主觀的感受，所以是相當複雜的研究課題。況且生活的物質條件和方式隨時代而不斷改變，貧窮的定義便難有永恆的標準，正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關乎貧窮的研究便必須經常進行。

### 窮人的數目與貧富差距

以領取綜援的人數來說，香港現有窮人的數目是歷來最多。接近700萬的香港人口中，約有50萬倚靠綜援維持基本生活。這50萬人為什麼貧窮？以下再作解釋，但一些人認為窮人數目增加，是香港貧富懸殊產生的結果，這看法卻甚有商榷餘地。

單從數字看，香港收入最平均的時期是在1970年代，主要原因是當時四成多勞動人口從事製造業，收入較平均；但到了1990年代，製造業式微，大部分勞動人口從事服務業，收入差距較大。因此，除非政府在財政政策上作出重大改變，著意縮減高低收入的實質距離，否則貧富差距擴大是意料中事。事實上，收入分布與經濟結構最有密切關係，而政府的財政政策只能產生輕微的均衡作用。

香港貧富差距擴大與綜援個案的增加，只是一時的巧合，兩者不一定有關係。綜援的個案數目受眾多因素影響，貧富差距只是其中之一，也不是最重要的。

### 香港窮人的數目為什麼增加？

香港為什麼多了窮人？25年前，我受政府委託對香港的貧

窮狀況進行調查。我採用了Peter Townsend教授倡議的生活方式研究方法來訂定「貧窮線」。調查中我發覺貧窮主要由兩個原因造成：一是年老而缺乏倚靠、二是子女眾多而家庭收入偏低。因此，我建議成立退休保障制度，以減少老來生活無著。至於子女眾多的貧窮家庭，因當時香港已廣泛推行家庭計劃，這類家庭應逐步減少。

回看今天領取綜援的類別，可見香港的貧窮情況變得異常複雜。老弱傷病仍是貧窮的主要成因，但綜援個案中，年老和傷病人士從過往佔九成多，到現在降至六成；其餘四成，分別是失業人士、單親家庭和低收入人士。換言之，今天窮人面對的問題和困難是多方面的，要為他們提供協助，單是金錢並不足夠；至於如何幫助他們脫離貧窮，更須從多方面入手，也不是一兩種措施便可達到目的。

我以前在英國讀書時，聽教授說：「複雜的社會問題，難有簡單的解決辦法。」貧窮當然是複雜的社會問題，所以對於口號式的建議，我都投以懷疑的眼光，寧可相信一些實實際際改善窮人生活的方法，為窮人做一點實事。

## 如何減少跨代貧窮？

現在返回論壇主題，也就是如何減少跨代貧窮？如何協助貧窮家庭的兒童，本身已異常複雜，至於如何防止他們長大後不再走上他們父母貧窮之路，更是難上加難。但艱難的事總有解決的辦法。

一月初發表的施政報告，特首提出了一些減少跨代貧窮的措施，為0至24歲在貧窮家庭生活的兒童多做一點事。周一嶽局長隨即宣布在屯門、元朗、深水埗、將軍澳四個地區推行試驗計劃。這些計劃是否收效有待驗證，但為貧窮家庭的兒童多提供一點協助總是好的。

研究顯示，在貧窮家庭中長大的兒童，在以下四方面較為欠缺：學習能力（包括語言）、分析視野、社交技巧、自我形

象。貧窮家庭裏的兒童如在這四方面長期落後於環境較佳的兒童，他們以後墮入貧窮之中的機會也相應增加。為了協助貧窮家庭的兒童，我希望政府在推行試驗計劃時，能定下明確的量子度指標，作為改善相關計劃和服務的標準。

看闊一點，我認為貧窮家庭的兒童能否走上成功之道（成功不是賺大錢，是發展所長，在社會上有立足的能力），還得看兩個條件。第一是香港教育制度能否達到培育人才的目的。我不是從事教育研究，但減少跨代貧窮，教育的貢獻至大，扶貧委員會中沒有教育工作者是一大憾事。第二是香港社會必須保持競爭力，為有能力人士提供機會。沒有發揮一己所長的機會，或機會窒息了，或為少數人所壟斷，都會把窮人一代一代的壓在最底層。

## 如何制定減少跨代貧窮的社會政策

（梁魏懋賢）

剛才幾位講者的發言都能引發大家的思考。跨代貧窮這個課題是很易明白的，跨代貧窮是指一代的貧窮或不利環境傳到下一代，父母的貧窮影響子女的成長。剛才周教授與大家回顧過去的歷史，大家都瞭解香港過往的情況。在1930至1950年代期間，有很多兒童失學，又出現童工問題。當時亦正正是香港小童群益會成立，希望針對當時街童等問題。1950至1970年代，由於教育仍然缺乏，我們主要教導他們一些知識。1970至1990年代是屬於香港經濟起飛的時候，物質十分富裕。到1990年代，正正是香港高科技、高增值之年代，是一個競爭十分劇烈的年代，亦有很多社會改革。至於未來發展，我希望可以透過制定一些政策而減少跨代貧窮，這是我們的願望。

至於人口方面，我不會詳加講解，因為大家都很清楚。在兒童貧窮方面，除了接受綜援家庭的小朋友外，當中亦有13萬



多的小朋友是處於入息中位數一半以下的，而某一些區域亦值得我們留意。坊間有很多研究都探討貧窮對兒童的影響，一般認為教育對小朋友十分重要。英國的一份雜誌在一月發表了一項醫學研究結果，指出貧窮小朋友的健康比較差，他們因意外而受傷的機會亦較多。另外，亦有指貧窮家庭對小朋友一些物質供應缺乏，因而對他們的發展亦有很大影響。另一些研究希望找出閱讀能力與貧窮的關係，他們進行了20至40年的研究，瞭解到如果閱讀能力低，會做成貧窮、犯罪和濫藥的情況。有關學習設施方面，由於現在兒童學習需要很多的配套，而社聯之前的研究亦指出，有25.6%的小學生沒有個人電腦，超過40%沒有上網的設備。中學生方面，沒有個人電腦的佔17.4%，沒有上網設施的亦有27%。另外，在課外活動方面，縱使有很多活動是免費的，但是交通費往往是一個問題。在2000及2004年有關綜援兒童心理素質的研究指出，超過五成的兒童是有較多的負面情感，他們會比較悲觀、煩躁和焦慮，而他們的自尊感亦比較低，在抗逆能力方面的表現也是平平，這表示他們遭遇挫折時亦比較難於面對。

貧窮數字亦是大家關注的，不過我們更關注的是進入貧窮的人數相對於脫離貧窮的人數。如果不斷有人進入貧窮，而脫離貧窮的人士是比進入貧窮的人士的數字低，那便是貧窮的延續，問題便會繼續下去。而跨代貧窮的出現，是由於小朋友出生於貧窮家庭，這些小朋友是有比較大的可能成為貧窮的成年人，於是這個循環便再繼續。所以，當我們處理貧窮問題時，是需要處理家庭和兒童兩方面。

現在我嘗試從比較實務的角度探討這個問題。我們分別在沙田區及深水埗區進行了一個機會工程計劃，這是為期20個月的計劃，計劃希望可以給予小朋友及其家庭一個機會。我們針對六至九歲的小朋友，當中亦包括他們的家長。我們從四個層面入手，首先是認知及情緒的發展，第二是健康及營養的關注，第三是學業及學習，在這方面我們選擇一些比較有這方面